

也谈我国数量经济学发展史

乌家培

《经济学动态》2016年第3期发表了李金华的大作《数量经济学在中国的源起、发展及其面临的挑战》一文(以下简称李文)。我读了以后,了解到当前我国数量经济学界存在的不少情况。因为观点可以自由发表,历史却不能随便修改。所以,我作为我国数量经济学研究的“过来人”对李文的历史描述部分有悖于历史发展真相之处,作些校正和补充。

李文误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许涤新所长任内于1980年夏天在北京颐和园举办的经济计量学讲习班作为我国数量经济学发展的“源起”,引发了与历史真相的一系列错位。尽管该讲习班对经济计量学在我国的普及和应用有重大历史意义,但我国对经济计量学的研究和批判早已有之。已故的北京大学胡代光教授和经济研究所孙世铮研究员,“文革”前曾受命于教育部,编写过西方经济计量学教材,他们寓批判于介绍中。但这还不是重要的,关键在于历史真相并非如此。我有必要指出以下三点:

1. 不能忘记孙冶方、于光远、马洪三位老一辈经济学家对创立和推动我国数量经济学的历史功绩。李文提到了老一辈经济学家许涤新,据我所知,许涤新1979年接待了以克莱因教授为团长的美国经济学家代表团,1981年率领中国经济学家代表团回访美国,这两项活动的部分工作我也参加了。但他与我国数量经济学发展的关系并不大,而真正有关系的却是孙冶方、于光远、马洪另外三位老一辈经济学家。

孙冶方是倡导我国数量经济学的第一位领导人。他作为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最早于1959年访苏回国后,向中央打报告,要开展经济数学方法研究,并把我从哲学社会科学部团委调回,要派我到苏联新西伯利亚涅姆钦诺夫院士领导的经济数学方法研究室进修。“文革”晚期,他被平反出狱后,还再三叮嘱不能放弃经济数学方法研究。

于光远是热心支持我国数量经济学发展并为其学科命名的领导人。1961年至1964年因我在国内

主要报刊上发表了好几篇关于经济数学方法的论文,于光远时任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处长,有一天晚上,他以“不速之客”来到我家,除鼓励我的研究外,还送给我几篇他写的关于两大部类间联系的数学分析论文,并谈起他要成立经济学家和数学家联盟的设想,认为在经济学中运用数学后还应发展出新的数学方法,后来他在办公室要见知名数学家华罗庚时叫我也去去了。改革开放后,他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时,曾指示我以中国经济数学方法研究会的名义,召集全国主要高校和研究机构约30名经济学家、数学家、管理学家、工程技术专家,在友谊宾馆开会讨论经济数学方法改名为数量经济学的问题。我们一共提了12个名称并说明每个命名的理由,向他汇报后,他赞同多数人的意见,决定选用数量经济学(quantitative economics)的学科命名。

马洪是积极组织推动我国数量经济学研究的领导人。他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二任院长时,提出筹建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所,当筹建工作快要结束时,他又根据国务院领导的意见拟扩大数量经济学的研究队伍。《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杂志先在内部发行,一年后在国内外公开发行。他先后两次为该刊撰文表示祝贺和支持,并指明数量经济学发展方向,这在当时是罕见的。

2. 不能忽视我国数量经济学研究起步时在向苏联学习的基础上探索中国自己发展道路的努力,首先研究的是社会主义再生产模式、两大部类和各部门间经济数量联系,而把从美国引进经济计量学并加以应用作为我国数量经济研究的起点是与历史真相相违背的。我国数量经济研究的起点并非如李文所说的,是20世纪80年代初向美国学习,引入经济计量学并加以应用,而是从60年代初开始的。一方面,学习苏联在经济研究和计划工作中运用数学方法和电子计算机;另一方面,批判西方资产阶级经济理论,对我国社会主义再生产模式、两大部类间和国民经济各部门间经济数量联系的研究。特别要指

出的是,我国学者强调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指导,以解决中国经济工作和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为目标,探索怎样走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这可以用1961年《经济研究》第11期发表的《在经济学中利用数学方法的两重任务》和1962年4月30日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经济数学方法的两个重要研究课题》等文为佐证。

20世纪80—90年代,在我国数量经济学发展热潮中,风行全国的不是经济计量分析,而是投入产出分析。那个时候,从中央到地方,从国家到企业,纷纷编制和分析投入产出表。这是深化再生产理论研究和细化计划统计工作的客观需求。记得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向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申报我国第一个数量经济学硕士点和博士点时,所用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9月出版的《投入产出法在中国的应用》(精装本),而非由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5月出版的《经济计量方法在中国的应用》。

我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时,完成了《经济数量分析概论》一书,中文稿从美国寄回国内,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我没回国前于1983年1月出版,而英文稿由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莱因教授帮我逐字逐句修改,在交谈中,他说经济计量分析固然是很重要的,但他年轻时,在美国密执安大学经济系参加工作时,主要所用的还是其他非计量的数量分析方法,比如时间序列分析等。

3. 不能否认20世纪60—70年代经济数学方法研究工作及其成果,特别是其对改革开放后数量经济学大发展产生的传承影响和基础作用,割断历史,无异于把我国数量经济学的存活时间缩减20年,不是历史唯物主义态度。李文把我国数量经济学研究及其成果限于经济计量学的引进与应用,而忽略了此前20年我国所做的经济数学方法研究工作及其成果。经济数学方法研究与数量经济学,一个作为新的研究领域,另一个作为新的学科,虽有一定区别,但它们的研究内容是相通的和相同的。经济数学方法也是数量经济学,没有前者的积累就没有后者的发展。

1961年8月1日《人民日报》第7版,几乎一整版,发表了《谈谈经济数学方法》一文,可以说这是向全国宣传和介绍数量经济学的重要开端。

“文革”前,我和张守一合译了苏联涅姆钦诺夫院士的重要遗作《经济数学方法和模型》一书,由我负责统校,后因“文革”动乱,连译稿也丢了,“文革”结束后,我在整理国民经济平衡组堆积的杂物时,无

意中发现了一大摞译稿,欣喜若狂,重新翻阅后,送商务印书馆,最后于1980年出版,并重印了一次。这本书是涅姆钦诺夫院士妻子参与整理的,是当时在苏联经济学界有重大影响的著作。

在国民经济平衡组组长杨坚白研究员的支持下,我带领张守一、甘兆熙到山西省考察,并由我写成了《关于在山西省试编部门联系平衡表条件的考察报告》(参见《乌家培选集》第181—200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这说明,我国经济数学方法研究一开始就重视实际调查。

在“文革”后期,我们从干校回京后,在这段“逍遥”的时间内,我还利用经济研究所图书馆收藏的外文书刊,阅读和整理了不少学术研究资料,并写成一些文稿。在“文革”结束后,修改完成了约7篇论文,如《探索社会主义再生产模式的若干问题》等,连同“文革”前发表过的13篇论文,收录于由三联书店1980年2月出版的《经济数学方法研究》一书。

除了上述对李文的三点意见外,我还想谈一下正确全面了解数量经济学发展史对促进学科顺利发展的重要意义。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发展历史,研究者应尊重和熟悉发展史,尽可能完整掌握发展史料,充分发挥学科研究存量的作用,以扩大学科研究的增量。在学科发展史中,已经解决了的问题,不宜老翻出来,以致分散力量和影响研究。比如说,学科不同于学派,学科有别于课程,数量经济学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研究任务和研究方法,它着重研究各种经济数量关系及其时空变化的规律性,数量经济学在经济学科体系中的地位,犹如数学在自然学科体系中的地位一样(以上参见辽宁人民出版社于1985年11月出版的《数量经济学若干问题》)。如果借口质的研究与量的分析不可分割来否定数量经济学的学科命名,这就同否定数学的存在一样可笑。

综观我国数量经济学半个世纪来的发展,它的外溢效应胜过内部影响,虽说它的学科体系并不完整,但它促进了我国经济、经济研究和经济工作的数量化和信息化,推进了各门应用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和经验研究。我国数量经济学只有与时俱进才有生命力,这需要依靠代代相传的数量经济学研究工作者个人努力和集体努力。新兴学科的明天总是美好的,数量经济学的未来属于我们大家。

(作者单位:国家经济信息中心)

(责任编辑:谭易)